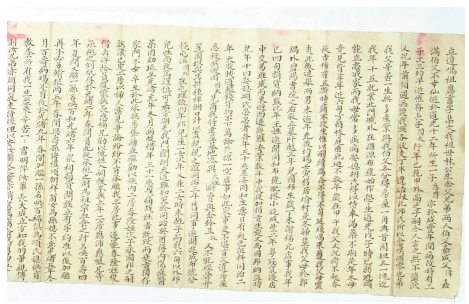
从墙缝里发现历史

——徽学专家刘伯山的收藏故事

2010年1月28日下午，韩国国学振兴院的全体研究员，正在凝心聚神听讲座。“我们只有抢救历史文化遗产的责任，而没有占有的权利。‘学术乃天下共器’，而不应该个人自私垄断。为国家、民族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做贡献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应有的品质，也是中国传统‘士’的精神体现！”主讲台上，一位气宇轩昂的学者掷地有声，听罢翻译之后，台下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赞叹声。这位主讲人就是从中国远道而去的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黄山文化书院院长刘伯山，应韩国国学振兴院院长的邀请，发表了题为《我与徽州文书的抢救》的演讲。

说起与徽州文书的故事，刘伯山的思绪便会飘回到1981年的冬天。 张亚琴





“伯山书屋”及收藏的徽州文书

墙缝里的旧纸包

那年的冬天，刘伯山还在大学念书。在黄山市屯溪郊区的乡下，他在一座徽派建筑老屋的墙缝里，无意中发现其中有一个发黄的旧纸包。取出来一看，里面竟然包着许多土地买卖的契约，有的上面还盖着红印，居然有二三十份之多。再仔细看，日期从清朝中期直至民国末年的都有。

当时，专业是哲学的刘伯山，并没有意识到这包旧纸的价值，出于好奇，他把它收藏了起来。刘伯山没有想到，几年之后，他的一生，会和这些古代的文书再也无法隔离。

1983年，刘伯山大学毕业分回了徽州工作，这给他接触到徽州文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

为搜集倾己所能

上任《徽州社会科学》杂志主编，让刘伯山与徽学的关系更为密切。1988年，他搜集到了第一本徽州谱牒。从那以后，徽州文书的收集成为他最重要的工作。

1990年，刘伯山结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周绍泉先生，托他在可能的情况下，在徽州民间代为收购古代文书。至1993年10月，刘伯山已获得徽州文书1580余份。考虑到徽州文书的研究应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问，自己的兴趣和专长不在此，何况那时，徽学研究在徽州本土也还没有形成气候，于是，他就应所托，转让了1560余份徽州文书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图书馆。

随后的一年多，刘伯山对徽州文书的收集停顿了。但他的心情一刻也没有轻松过：徽州文书的流失速度很快！一种是自然地消蚀，另外一种就是被日本、美国、法国、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个人收买而带走。面对这些，刘伯山决定倾个人之所能，对此进行抢救性地挖掘，在他的心中，徽州文化在中国，徽州文书也应留在中国，这是历史的责任，是完成过去向未来交接的一种责任！

为此，刘伯山花尽积蓄，甚至举债收集。有时为查证一个线索，一天来回奔走六七十里山路。至1998年底，所获文书的数量已初具规模，遂起名“伯山书屋”收藏。2000年8月，他所藏徽州文书已超过万件（部）。可在这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成立，刘伯山被调去工作。

私人珍藏无私捐献

2001年，刘伯山将自己历经12年心血收集珍藏的1.1万余份（部）徽州文书，悉数捐献给安徽大学，学校在徽学研究中心设立了特藏室——同样命名为“伯山书屋”。

谈起捐献的初衷，刘伯山说，那份在安徽大学举办“刘伯山万份徽州文书捐献仪式”上宣读的“捐献书”就是他的心愿。

安徽大学：

徽州文书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是徽学这门学科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之一。笔者从1988年开始，在民间收集、抢救徽州文书，经初步清点，已经获得11052份（部），其中，明代契约文书154份，清代契约文书6407份，民国间契约文书2627份，年代不详文书1533份，谱牒与抄刻本291部。这批徽州文书原件，全系笔者个人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在民间收集、购买所得，属个人所有，无权属之争。

学术乃天下共器。徽州文书是历史遗产，也应当归属于社会。在此，笔者郑重宣布：自即日起，笔者将上述个人搜集所得的11052份（部）徽州文书悉数捐献给安徽大学，归安徽大学所有。恐口无凭，立此捐献书。希望这批文书在安徽大学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研究和利用；也希望笔者的这一举动，有益于推动全社会重视徽州文书的抢救与保护，不要让徽州文书流失，不要让徽学重蹈敦煌学那样“敦煌在中国，敦煌文书在海外”的覆辙。

特此！

捐献人：刘伯山（签字）

2001年5月19日

据介绍，徽学研究中心的“伯山书屋”所藏的徽州文书有家乘谱牒和各种稿本、抄本及刻本书近300部500多册，最早的文书是明代早期的，清代文书最多，最晚的一份是公元1984年的，而且种类繁多。

目前，刘伯山主编的《徽州文书》共整理出版三辑三十卷，在他看来，在当下及今后，尤其紧迫的是拜访请教健在的徽州老人，抢救徽州口碑资料，对此，他将不遗余力，倾己所能。 **本版图片由刘伯山提供**

徽州文书寻获记

讲述人：刘伯山

整理：张亚琴

在我搜集徽州文书的这些年中，历经风雨，吃尽苦头，其中发生了很多故事。现讲述几个寻获记，它是真实记录我最初获得文书的过程，有些还加有我为弄清和确认文书的实际出自地而进行的田野调查。

《黟县十一都卢村（卢大奎户）卢氏文书》

1998年4月23日上午我们到达宏村时，先去了朋友老松家。从老松家去黄村口要经过承志堂，而当年朋友孙殿华开的一家古玩店就在承志堂斜对面。大约两个月前，我曾对店主孙殿华提出：只要你有契纸等东西了，就留着给我。

到了孙殿华开的店时，已近中午。他说：“正要打电话给你，前几天在卢村，我弄到了一点旧纸。”说着，从墙脚处拎出一个编织袋，约莫有半袋，放在我脚下，说：“这本来是由一个箱子装的，堆在楼上，箱子太烂，我没有要，里面的东西乱七八糟，尽是一些纸片纸头，反正我也不懂，一起倒进袋里，是你说要的。”我打开袋口，略施翻看，发见契约、税票、账单、账册等皆有，尤以税票为多；其契约有些是原折着的。我问：“是从一家收来的？”他回道：“嗯，是一个老房子，在村头。”我又问：“卖给你的是什么人？”“一个老头，应该姓卢，因为卢村基本上都姓卢。”

我回家对这户文书一整理，定名《黟县卢村卢氏文书》，后因我从孙殿华处又获得黟县卢村卢氏的另一户文书，故2005年在重新整理这户文书时，将其改名为《黟县十一都卢村（卢大奎户）卢氏文书》。它共有315份（部），最早的一份是《清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卢廷祥等立议墨合同》，最晚的一份是《民国三十二年七月卢宗明业户陈报收据》。

《芜湖<商务日报>档案》

《芜湖<商务日报>档案》系2000年2月20日从黟县宏村汪双武处获得，问其出自地，答在黟县宏村周边。它共有23份。

芜湖《商务日报》是有案可查的报纸，尽管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此报保留至今的原件，但据人们对芜湖报业史的研究，芜湖《商务日报》当是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创办的《鸠江日报》易手改名而来，接手人是当时在芜湖的维新人士吴少斋；至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该报停刊。从这批档案中的一份《论本报之造端抄白》所反映的内容看，该报确实具有维新性质。

这批档案文书是在黟县北部乡村的民间发现的，并且其发现至今具有唯一性。一个在慈禧实际统治期间创办的寿命很短的具有维新性质的报纸，其办报的档案最后在徽州黟县的乡下民间得到保护和保存，直至在九十多年以后被发现，对此现象能够作的合理解释就是：此报纸一定与某个黟县人关系密切，并且这个黟县人极有可能是黟县北乡人，这些档案是被他带回到家乡而加以妥善保存的。

